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天盛律令》典当借贷门整理研究

于光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杜建录 波波娃 主编

《天盛律令》典当借贷门整理研究

于光建 著

宁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
(BQD2014004)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盛律令》典当借贷门整理研究 / 于光建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8624-0

I . ①天… II . ①于… III . ①典当业—民法—法制史
—研究—中国—西夏②《天盛律令》—研究 IV .
①D929.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2136 号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书 名 《天盛律令》典当借贷门整理研究
作 者 于光建 著
责任编辑 谷 玉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 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印 刷 金坛古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25 字数 333,000
国际书号 ISBN 978-7-5325-8624-0 / K · 2386
定 价 78.00 元

宁夏大学“提升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项目”资助出版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编委会

顾问：史金波 李范文 克恰诺夫

主编：杜建录 波波娃

编委：（以姓氏笔画排序）

孙伯君 孙继民 李华瑞 杨 浣 沈卫荣 佟建荣

林英津 荒川慎太郎 胡玉冰 段玉泉 聂鸿音

索罗宁 梁松涛 彭向前 韩小忙 景永时 薛正昌

总序

西夏在中国,大量的西夏文献收藏在俄罗斯,西夏研究成为中俄两国共同关注的学术领域。为此,2009年在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教育部)将“西夏文化研究”列入两国语言年活动项目,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和宁夏大学承担。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签订协议,成立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机制下研究机构——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教授任中方所长,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波波娃教授任俄方所长。

2010年7月26日,我利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银川学术年会间隙,专门考察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该院主持完成的《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说西夏》等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教育合作分委会主席,我高兴地看到,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每年都有新成果、新亮点。2010年10月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宁夏大学揭牌,2011年9月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揭牌。连续召开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一批西夏学中青年骨干赴俄罗斯访问研究。更令人欣慰的是,两国学者不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往来上,而是围绕西夏法律文献、社会文书、佛教典籍等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相继完成“西夏社会文书研究”、“夏译《孟子》研究”、“天盛律令研究”、“党项西夏碑刻研究”、“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释录”等课题,陆续出版的《西夏文献研究丛刊》和《黑水城出土汉文社会文书释录》,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源远流长，上世纪 30 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刊出西夏文专号，中苏等国西夏学者发表成果，相互酬唱，成为佳话；90 年代以来，中俄两国学者联合整理出版大型文献丛书《俄藏黑水城文献》；进入新世纪，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框架下的西夏学合作研究，是在西夏文献整理出版基础上的深入研究，相信在两国政府的支持和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为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教育合作分委会中方主席
郝 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目 录

总序	1
绪论	1
上篇 文献译释	13
凡例	15
第一章 当铺门	16
第一节 《名略·当铺门》校勘考释	16
第二节 《当铺门》校勘考释	18
第二章 催索债利门	51
第一节 《名略·催索债利门》校勘考释	51
第二节 《催索债利门》校勘考释	54
第三章 出典工门	93
第一节 《名略·出典工门》校勘考释	93
第二节 《出典工门》校勘考释	96
下篇 专题研究	127
第一章 《天盛律令》中的债权及以工抵债问题	129
第一节 《天盛律令》中的债权保障	129
第二节 关于出工抵债的几个问题	142
第二章 《天盛律令》中的官营典贷及利率问题	153
第一节 《天盛律令》中的官营典贷	153
第二节 借贷利率及相关问题	172
第三章 《当铺门》在民间典当中的实践	182

第一节 四件西夏文典畜契约译释	182
第二节 《当铺门》对民间典当的规范	195
第四章 典贷中的“中间人”及相关问题	202
第一节 《天盛律令》中对“中间人”的表述及规制	203
第二节 中间人的职责	211
结语	222
参考文献	228
 附录	241
附录一：《天盛律令》卷三当铺门、催索债利门图版	243
附录二：《天盛律令》卷十一出典工门图版	259
附录三：西夏文字词索引	268
附录四：西夏文草书借贷典当契约常用词汇表	277
 后记	286

绪 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宋辽西夏金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由唐朝中期开始的社会变革,到宋朝已完全定型。^① 大变革的表现之一就是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和繁荣,促使了租佃和借贷契约关系在生产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由此而引发了社会阶级关系的重大变革。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产力的提高,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在这样的时代变革背景下,其境内的商品买卖、典当、借贷经济在契约关系中也较为活跃。与之相适应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专门制定了严格而详细的典贷律法,将典当借贷经济纳入到法律的规范和保障之下,使之合法而有序地发展。

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西夏文《天盛律令》卷三《当铺门》、《催索债利门》、卷十一《出典工门》及卷十七中“官物借贷”为典当借贷及相关条文。从戈尔芭乔娃、克恰诺夫《西夏写本和刊本》^②公布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法律文献目录中,得知《天盛律令》总共有 124 个编号,未考订具体内容者有 23 个编号。其中属于卷三的有 Иhb. NO154、156、169、2572、2576、2578、2580、2590,共 8 个编号。《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八册刊布的《天盛律令》甲种本,^③刊布的卷三有四个编号,即在 Иhb. NO169、Иhb. NO2576、Иhb. NO2578 三个文献缀合的基础上,增加了 Иhb. NO4188,构成了通行的《天盛律令》卷三。增加的

^① 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 页。

^② [俄] 戈尔芭乔娃、克恰诺夫著:《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第 46~68 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白滨译《民族史译文》第 3 辑,1978 年。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Инв. NO4188 仅有 1 页, 内容是卷三门类条目。克恰诺夫俄译本^①《天盛律令》卷三是利用 Инв. NO2576、154、2580 三个编号文献缀合的。据此比较可知, 目前仍有 Инв. NO156、2572、2590 三个编号的文献尚未刊布。

《西夏写本和刊本》记录的《天盛律令》卷十一共有 Инв. NO174、175、176、177、178、179、180、180a、713、2591, 共 10 个编号。但《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八册刊布卷十一的条例只是在 Инв. NO176、178、180 三个文献基础上缀合而成。克恰诺夫俄译本《天盛律令》卷十一是利用 Инв. NO2591、178、180、179 缀合的。目前还有编号 Инв. NO174、175、177、180a、713 五个编号文献没有刊布。

上述可见,《天盛律令》甲种本是由多种编号缀合的文本, 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夏版本, 编者在若干复本中, 选择存字较多的一种, 为学界缀合出一部相对完整的西夏文本, 开山之作, 功不可没。但由于文献完残不一, 即使是很残的复件, 往往也能补缀文本之缺佚。加之, 文献整理缀合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难免挂一漏万。如卷十五《催缴租门》漏译第一、二行;《催缴租门》第三至十一行被错置在《春开渠事门》, 因此, 有必要对通行的文本进行校勘补正。^② 这是其一。

其二, 汉译本《天盛律令》开创了直接将西夏法律文献译成汉文的先河, 尤其是史金波等先生利用整理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便利, 通过西夏文佛经发愿文、夏译汉籍、西夏文辞书、类书、诗歌等文献中的资料, 解决了大量法律术语和名物制度的翻译, 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汉文译本, 而且为后来翻译西夏文《亥年新法》、《法则》等法律文献提供了重要依据, 也为解读西夏社会文书提供了重要依据, 成为迄今最为通行、影响最大的译本。

但西夏文是一种死文字, 西夏文《天盛律令》又是多种文本缀合, 目前通行的汉译本除了所依据西夏文本缺漏、页码错乱等方面的问题外, 在译文上还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如有的是意译, 有的是音译, 缺少利用夏汉对音对义小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夏译汉籍、夏译佛经等西夏时期的对译材料进一步考证注释, 学界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出现望文生义的现象, 为此非常必要进一步考释, 以便研究者使用。

其三, 传世的 1500 余件西夏文社会文书中, 买卖、借贷、租赁等契约文书多达 500 多件,《天盛律令》中典当借贷条例又非常详尽, 这样一来, 把西夏法律制度层面的规定和实际运用层面上的典当借贷文契结合起来研究成为可能。在杜建录等老师的积极倡导下,

^① [俄] Е. И. Кычанов, *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1149 – 1169*, кн.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7。

^② 潘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催缴租门〉一段西夏文缀合》,《宁夏社会科学》2012 年第 6 期, 第 94~96 页。

这种研究正成为当前西夏学研究的新趋势。

其四，“俄藏西夏法律文献整理研究”，是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重点项目，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联合实施，为本选题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二、国内外研究进展

二十世纪初，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盗运走了大批珍贵的西夏文献文物，其中就包括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在内的诸多法律文献，这批文献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科学研究中心东方学研究分所。1932年，前苏联著名西夏学专家聂历山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发表了《西夏书籍目录》，首次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消息公布于世，而且在其另一著述《西夏语研究小史》中将其名称翻译为《天盛年变新民制学》，聂历山由此也成为浩如烟海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第一人。1963年，戈尔芭乔娃和克恰诺夫在编著《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对该西夏法典的藏号、文献特征、卷次、保存状况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著录。

（一）《天盛律令》的翻译与研究

鉴于该法典对解释西夏社会历史面貌的重要性，克恰诺夫开始专注于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译释研究工作，先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研究文章中引用了该法典的内容。1987年至1989年克恰诺夫出版了俄文版《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四卷本。^①第一卷为其对该法典的研究成果，第二至四卷是他对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翻译和图版，取得了较高的研究成果，让学术界第一次看到了《天盛律令》的基本全貌和内容，引起了国内外西夏学研究者对该法典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1988年，我国学者李仲三先生将克恰诺夫俄译本中的《天盛律令》第一至七卷翻译成汉文《西夏法典》（1至7卷）。^②1994年，我国西夏学专家史金波、聂鸿音、白滨三位先生将西夏文《天盛律令》进行了全文汉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汉译本《西夏天盛律令》。1998年，《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9册出版，根据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大量西夏文法律文献，刊布了整理缀合后较为完整的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俄藏甲种本）以及其五种写本及

^① [俄] Е. И. Кычанов, *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1149 – 1169*, кн.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7.

^② [俄] 克恰诺夫著，李仲三译：《西夏法典》（1—7卷），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残页,补充了克恰诺夫俄文本中所缺的《名略》等大量内容。之后,史金波等先生重新对先前出版的汉译本进行了修订,出版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后文以“汉译本”简称),成为学界最为通行的汉译本。^①

汉译本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对西夏法律制度研究的热潮,学界推出了一批有关西夏法律及其制度的著作。如,王天顺《西夏天盛律令研究》^②、杨积堂《法典中的西夏文化——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研究》^③、杜建录《〈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④、姜歆《西夏法律制度研究——〈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初探》^⑤、陈永胜《西夏法律制度研究》^⑥、邵方《西夏法制研究》^⑦等著作,在探讨《天盛律令》特点、研究条文内容等基础上,论述了西夏的刑法、民法、经济法、财政法、军事法、行政法、宗教与禁卫法等,阐述了其特点和历史文献价值,为研究西夏法制及其社会制度打下了基础。

此外,自从《天盛律令》的汉译本出版以来,依据《天盛律令》,许多学者从历史学、法学、文献学角度发表了百余篇文章,从微观角度来研究西夏的法律、职官、农业、水利、畜牧业、商业、宗教、婚姻、丧葬等一系列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杜建录《西夏畜牧法初探》从国有牧场的管理、群牧生产及其产品分配三个方面对西夏畜牧法进行了详细论述。^⑧ 韩小忙《天盛律令与西夏婚姻制度》对卷八《为婚门》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唐宋律法,讨论了西夏的婚姻制度和特点。^⑨ 杨蕤《〈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与西夏政区刍议》通过对司序行文门的解读,廓清了西夏政区概况,并纠正了汉文史籍对西夏政区记载的不足,并就政区特点进行了讨论。^⑩ 王天顺《〈天盛律令〉与西夏社会形态》探究了西夏的社会形态。^⑪ 崔红芬《〈天盛律令〉与西夏佛教》依据《天盛律令·为修寺僧道门》讨论了西夏的法典对佛教、道教及僧道的规定和制度。^⑫

(二) 汉译本《天盛律令》补正

尽管西夏文《天盛律令》图版已经在《俄藏黑水城文献》刊布,汉译修订本也已经出版,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

^② 王天顺:《西夏天盛律令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③ 杨积堂:《法典中的西夏文化——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

^④ 杜建录:《〈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⑤ 姜歆:《西夏法律制度研究——〈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初探》,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⑥ 陈永胜:《西夏法律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

^⑦ 邵方:《西夏法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⑧ 杜建录:《西夏畜牧法初探》,《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第107~113页。

^⑨ 韩小忙:《〈天盛律令〉与西夏婚姻制度》,《宁夏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31~38页。

^⑩ 杨蕤:《〈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与西夏政区刍议》,《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21~131页。

^⑪ 王天顺:《〈天盛律令〉与西夏社会形态》,《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32~143页。

^⑫ 崔红芬:《〈天盛律令〉与西夏佛教》,《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58~163页。

但仍有许多残卷尚未公布,汉译本中也存在缺译、误译现象。如,日本学者佐藤贵保《西夏法典贸易关联条文译注》^①对汉译本中有关贸易条文错误进行了纠正考释,其《未刊俄藏西夏文〈天盛律令〉印本残片》一文则利用未刊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残片补充了已刊本卷十九所缺部分内容。^②

聂鸿音《俄藏 6965 号〈天盛律令〉残卷考》^③、《西夏〈天盛律令〉里的中药名》^④分别补充了汉译本卷十四的所缺部分内容,以及纠正了汉译本中卷十七物离库门中误译和尚未解决的中药名称。韩小忙《俄 ИНВ. No.353 号〈天盛律令〉残片考》利用刊布的《天盛律令》乙种本残片,对汉译本卷十一出典工门中的残缺字词予以了补正。^⑤许伟伟《〈天盛律令·节亲门〉对译与考释》^⑥、文志勇《〈天盛律令〉卷一及西夏法律中的十恶罪》^⑦分别在将《天盛律令·节亲门》及卷一重新进行翻译和注释的基础上,并对通行的汉译本中所出现的错误提出了纠正,对难以理解或与译文分歧较大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同唐宋律法中的十恶罪进行了比较研究。

潘洁^⑧、许伟伟^⑨、翟丽萍^⑩博士学位论文分别对《天盛律令》卷十五有关农业水利租税的条文、卷十二内宫制度条文、卷十职官政区条例重新进行了对译考释,对汉译本中的失误、疑难等问题详细考证,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为以后《天盛律令》的全面展开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成功的典范。刘艳丽《西夏典当制度简论》利用《天盛律令》卷三当铺门条文对西夏的典当制度予以了梳理论述。^⑪

(三) 西夏典当借贷制度

西夏社会不仅官方经营典当和借贷,而且在民间也非常活跃,官营典当借贷收益和征收买卖税也成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和来源之一。为了规范境内的典当借贷经

^① [日]佐藤贵保:《西夏法典贸易关联条文译注》,载《丝绸之路与世界史》,大阪大学研究院文学研究科 2003 年,第 197~255 页。

^② [日]佐藤贵保:《未刊俄藏西夏文〈天盛律令〉印本残片》,新泻大学主编《西北出土文献研究》第 6 期,第 55~62 页,新泻西北出土文献研究会 2008 年。汉文译文见《西夏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124~128 页。

^③ 聂鸿音:《俄藏 6965 号〈天盛律令〉残卷考》,《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3 期,第 17~18 页。

^④ 聂鸿音:《西夏〈天盛律令〉里的中药名》,《中华文史论丛》2009 年第 4 期,第 291~321 页。

^⑤ 韩小忙:《俄 ИНВ. No.353 号〈天盛律令〉残片考》,载《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第 129~131 页。

^⑥ 许伟伟:《〈天盛律令·节亲门〉对译与考释》,《西夏学》第 4 辑,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78~83 页。

^⑦ 文志勇:《〈天盛律令〉卷一及西夏法律中的十恶罪》,《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 年第 5 期,第 32~42 页。

^⑧ 潘洁:《〈天盛律令〉·农业卷研究》,宁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⑨ 许伟伟:《〈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内宫待命等头项门〉研究》,宁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

^⑩ 翟丽萍:《西夏职官制度研究——以〈天盛革故鼎新律令〉卷十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

^⑪ 刘艳丽:《西夏典当制度简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济活动,《天盛律令》有专门的《当铺门》、《催索债利门》、《出典工门》来规范典当借贷经济。这些珍贵的法律条文为揭示西夏典当借贷经济活动提供了资料基础,学术界利用这些材料开始探究西夏典当借贷经济,这也为解读出土的西夏典当借贷契约提供了法律制度层面的依据。

史金波先生《西夏社会》中详细探讨了《天盛律令》中有关借贷和典当的法律规定,并释读公布了中国藏和俄藏的十数件借贷和典当契约,为学术界提供了研究便利。杜建录先生《西夏高利贷初探》一文及《西夏经济史》^①著作中结合出土的西夏借贷典当契约以及《天盛律令》卷三之《当铺门》和《催索债利门》,详细论述了西夏境内的典当借贷经济活动,并就借贷的流程、利率、剥削率、违约处罚、以工抵债等问题予以详尽考论,揭示了西夏社会高利贷亦非常盛行的现象。杜先生《〈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第三章第一节债务法中就西夏买卖债务、借贷债务、典当规定、利率限制、担保责任、债务清偿等诸问题的研究更是深入细致。

利率是研究典当借贷的重要内容之一。史金波^②、杜建录^③先生根据出土的贷粮、贷钱契约中对利息的记载和换算,科学揭示出《催索债利门》“一缗收利五钱”是指货币借贷日利率,即贷钱日利率是0.5%,月利率是15%;“一斛收利一斛”当为对粮食借贷利率的总额限制,解决了学术界对西夏借贷利率问题的迷惑。

赵彦龙^④、孟庆霞^⑤等依据目前学界已经公布和考释的汉文、西夏文契约实物,结合《天盛律令》的规定,考察了西夏契约成立的要素、违约责任、担保制度、借贷(典当)利息、借贷缘由以及行文格式等制度。

(四) 典当借贷契约译释

在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等大型资料集成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了大量西夏社会文书,其中就有许多汉文、西夏文典当和借贷的契约。据史金波先生整理研究,仅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就发现了100余号,计500多件契约,有借贷契约、典当契约、买卖契约。如此众多的数百件西夏典当和借贷契约文书是明

^① 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②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 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④ 赵彦龙:《西夏时期的契约档案》,《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26~32页;《西夏契约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第105~111页;《西夏契约成立的要素》,《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论西夏契约及其制度》,《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86~90页;《西夏契约再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79~100页。

^⑤ 孟庆霞、刘庆国:《简论西夏法典对买卖契约的规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21~124页。

清以前契约文献资料所不见。这些契约文书是西夏典当借贷经济在操作层面真实体现，有助于进一步解读《天盛律令》典当借贷条文，对深入研究西夏社会经济具有重要价值。

最早关注西夏典当借贷契约文书的是俄国已故著名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教授。1972年他在整理黑水城文献时，发现了一件西夏文行书体的《天盛庚寅二十二年(1170)耶和寡妇典卖土地契约》，并做了译释研究，这是第一次刊布西夏契约，引起了中外西夏研究者的重视。日本学者松泽博《武威西夏博物馆藏亥母洞出土西夏文契约文书について》一文亦对武威西夏博物馆收藏的亥母洞出土的几件西夏文契约进行了再译释。^①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西夏借典契约的价值。黄振华^②、陈炳应先生^③著作中对克恰诺夫所译《天盛二十二年卖地契》又进行了详细的译释研究，校正了克恰诺夫译文的失误。陈国灿先生《西夏天庆间典当残契的复原》对英藏斯坦因在黑水城盗掘文献中的西夏天庆年间的数件汉文典粮契约残件予以了复原和详细考释。^④孙寿岭《西夏乾定申年典糜契约》、《武威亥母洞出土一批西夏文物》介绍和译释了武威出土的典糜契约、典驴契约、买牛契约。^⑤

由于西夏的契约大部分是西夏文，而且多为草书书写，限制了学界深入研究西夏借贷和典当经济。而在西夏文草书契约解读方面，史金波先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解读了大部分契约文书，《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13、14册中整理刊布了500余件契约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⑥史金波先生《西夏粮食借贷契约研究》在论述西夏借贷典当经济法律制度的同时，就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20多件西夏借贷契约的时间、借贷者身份、出贷者身份，借贷粮食品种数量、利息和利率、偿还期限、违约处罚、签字画押以及算码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研究。^⑦史先生《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约》翻译整理了俄藏黑水城出土12件西夏文草书典卖土地契约，详细考证了土地买卖的时间、原因、数量、买卖双方身份、土地兼并、农户占有耕地数量、灌溉水渠、给水、官地、私地、熟地、生地、耕地

^① [日]松泽博：《武威西夏博物馆藏亥母洞出土西夏文契约文书について》，《东洋史苑》2010年第75号，第21～64页。

^② 黄振华：《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3～319页。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5～279页。

^④ 陈国灿：《西夏天庆间典当残契的复原》，《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⑤ 孙寿岭：《西夏乾定申年典糜契约》，载《中国文物报》1993年5月23日；《武威亥母洞出土一批西夏文物》，《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西夏研究专号。

^⑥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13、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⑦ 史金波：《西夏粮食借贷契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86～204页。

价格、耕地税、违约处罚、白红契等问题。^①《西夏文卖畜契和雇畜契研究》对俄藏黑水城出的14件西夏文草书卖畜和雇畜契约进行了翻译专题研究。^②杜建录、史金波二位先生合著的《西夏社会文书研究》整理研究了数十件国内外收藏的西夏文、汉文借贷典当契约文书,是目前译释整理西夏契约最多、研究最为深入的著作^③,2012年该书再版时又补充了十数件契约文书,成为学界研究西夏契约及其相关问题必不可少的参考。^④杜先生《俄藏西夏天庆年间典粮文契考释》对俄藏天庆年间的12件汉文典粮契约释文的基础上,从订立契约时间、文契格式与形制、偿还期限与违约处罚、借贷双方的民族成分、借贷利率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考证。^⑤

另外,王元林《西夏光定末年借谷物考释》^⑥、陈静《黑水城所出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麦契考释》^⑦、李晓明等《英藏黑水城文献中一件西夏契约文书考释》^⑧分别对俄藏《光定末年耶和小狗山借谷物契》、俄藏《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麦契》、英藏《天庆十三年裴松寿典粮契》进行了考释,对借贷谷物契的年代、内容、行文款式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民族问题进行了研究。许伟伟《黑城夏元时期契约文书的若干问题——以谷物借贷文书为中心》通过黑城出土的夏元时期谷物借贷契约比较,探讨了黑城地区的谷物种类、夏元习俗传承及经济活动特点等。^⑨张可辉^⑩、罗海山^⑪对敦煌研究院藏《嵬名法宝达卖地文契》的性质进行了新的探讨,认为该件文书是卖地订立契约之前的问账文书。马玲玲《西夏契约档案整理研究》学位论文从档案学的角度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等文献资料中收录的西夏买卖、借贷、典当等契约档案依据编号、契约名称、馆藏地等进行分类梳理统计,认为目前所见西夏契约档案共有213号,并与唐宋契约档案的内容进行了异同比较。^⑫

综上所述,自《天盛律令》汉译本出版以来,依据《天盛律令》,许多学者从历史学、法

^① 史金波:《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约》,《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45~67页。

^② 史金波:《西夏文卖畜契和雇畜契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3期,第1~53页。

^③ 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④ 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修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⑤ 杜建录:《俄藏西夏天庆年间典粮文契考释》,《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第55~59页。

^⑥ 王元林:《西夏光定末年借谷物考释》,《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第31~36页。

^⑦ 陈静:《黑水城所出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麦契考释》,《文物春秋》2009年第2期,第62~66页。

^⑧ 李晓明、张建强:《英藏黑水城文献中一件西夏契约文书考释》,《西夏研究》2012年第1期,第52~57页。

^⑨ 许伟伟:《黑城夏元时期契约文书的若干问题——以谷物借贷文书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95~97页。

^⑩ 张可辉:《官法私契与西夏地权流转研究》,《中国农史》2013年第3期,第93~101页。

^⑪ 罗海山:《“名法宝达卖地文书”考辩,载沈之北主编《三个U集——霍存福教授从教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62~76页。

^⑫ 马玲玲:《西夏契约档案整理研究》,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